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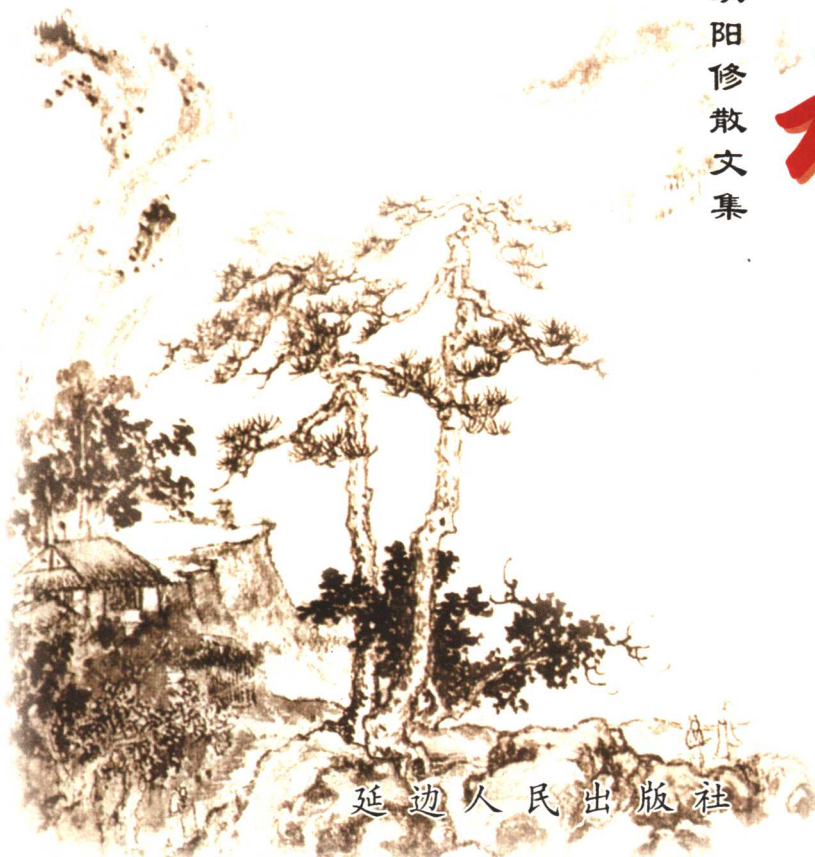
传世散文精品库

六一風神

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散文集

主 编
堵 军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六一風神

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散文集

主编 堵军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一风神/堵军编. - 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2004.9

(传世散文精品库)

ISBN 7-80698-293-0

I. 六… II. 堵… III. 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 IV. I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0639 号

责任编辑:崔承范

装帧设计:魏 红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六一风神——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散文卷

堵 军 主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, <http://www.ybchs.com>.)

北京市通州区皇家印刷厂印刷

延边人民出版社发行 印数:0001—5000 册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59 印张 315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8-293-0/I · 34

定价:389.00 元(全 14 册)

本卷定价:27.8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散文，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它同诗歌一样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，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，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，特编辑出版这套“传世散文精品库”。

散文文体范围，代有嬗变，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，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，上始于先秦，下迄于清末。各类作品均单独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，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，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。

本丛书与以前的选本相比，有其显著的特点。一是在原文的选择上，选得比较全面、科学，充分考虑了当代读者的审美情趣，体现了“大散文”的概念；二是在体例上，从读者学习和鉴赏的实际出发，尽量做到通俗易懂，所以每篇原文之后，都有简明扼要的注释、准确的译文和精美的赏析，使读者不仅能读懂原文，还能从原文、译文和赏析中获得多重的艺术享受，并且每本书都

有原文作者的简介,可以使读者对各大名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,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;三是各本书的编著者都是当今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,他们以渊博的知识,严格的眼光,科学的治学态度,完全保证了本丛书的内容质量,使本丛书成为“信得过产品”。可以说,这套丛书是当今名人选编、注译并赏析古代名人名作的成功之作。

我忝为本丛书的主编,面对各位前辈的书稿,常被各位前辈谦虚的态度、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。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人大、政协会议期间,赵朴初、谢冰心、启功、夏衍、叶至善、陈荒煤、吴冷西、张志公等八老提出的《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》,深感本丛书各本书的编著者与赵朴初等八老一样,都有一颗热爱中华文化,要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传给青年一代的滚烫的心,这尤其令人敬佩。

古人散文,多览物抒怀。故欣赏佳文,不仅可见锦丽江山,享卧游之乐;同时,还可知古同人之心,作世事之观。然而,古今易代,时移事迁,江山更秀,岂可以今人之心,作往古之幽思?思古人之怆然,惜今人之怡乐,不仅可作今昔对比,亦可激发斗志,再造山河,为后人思我者,作一导游者焉。故选此编,并为序。

编 者

2004年8月

欧阳修简介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，吉州永丰（今江西永丰）人。宋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）六月二十一日，欧阳修生于四川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，父亲欧阳观时任绵州军事推官。

欧阳修青少年时期是在贫寒中度过的。四岁时，父亲卒于泰州（今属江苏）军事判官任所。母亲郑氏年方三十岁，携带年幼的子女，前往随州（今属湖北）投奔亡夫的弟弟欧阳晔。母亲及叔父是欧阳修的启蒙教师。家贫无钱买纸，母亲以荻画地，教欧阳修读书写字，这就是古今盛传的“欧母画荻”的故事。

随州城南有大姓李氏，家中藏书丰富，欧阳修常往借书抄读。他读书刻苦，天资聪颖，往往抄书未毕，已能成诵。学作诗赋文章，文笔老练，有如成人。十岁那年，欧阳修在李家偶尔获得韩愈古文六卷，“读之，见其言深厚而雄博，……浩然无涯若可爱”。（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这一偶然的机缘，为日后北宋古文运动播下了种子。

为了应举入仕，欧阳修不得不学习骈四俪六的“时文”。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欧阳修十七岁，首次参加

随州州试，所作《左氏失之诬论》是典型的四六文，其中的名句“石言于晋，神降于莘。外蛇斗而内蛇伤，新鬼大而故鬼小。”传诵一时。但是，由于赋试脱逸了官韵，遭到黜落。三年后，他顺利通过随州州试，被荐名于礼部，却在次年春天的礼部贡举中落选。天圣六年（1028），欧阳修投书拜谒汉阳知军胥偃，受到赏识，被留置门下，悉心教诲，时文写作大有长进。天圣七年春试国子监、秋赴国学解试以及次年正月礼部应试，欧阳修三举榜首，并在天圣八年御试中获甲科第十四名进士，授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充西京留守推官。

天圣九年（1031）三月，欧阳修来到西京（今河南洛阳）就职。西京留守钱惟演是西昆派首领之一，喜文爱才。幕府里萃集众多文人名士，谢绛、梅尧臣、尹洙、尹源、张先等皆为僚属。欧阳修与尹洙等人相互倡作古文。这是他从政生涯的肇始，也是他涉足文学的起步。

景祐元年（1034）三月，欧阳修秩满还京，经考试，任命为馆阁校勘，参与编纂《崇文总目》。景祐三年五月，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因讥切时弊，与权相吕夷简发生冲突，被贬官饶州。身居谏职的高若讷，曲从宰相旨意，诋毁范氏为人。欧阳修激于义愤，挥笔写下著名的《与高司谏书》，替范仲淹辩护，严辞斥责高若讷，结果被贬为峡州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县令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三月，欧阳修由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通判任召回汴京，担任谏官。不久，升为知制诰，进入文学

侍从行列。当时，宋廷对西夏用兵失利，京东、京西民变纷起，仁宗迫于内忧外患，决心更新朝政。老相吕夷简被罢免，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，韩琦、富弼为枢密副使，全面实施庆历新政。

在庆历新政中，欧阳修踴厉风发，奋不顾身。他积极追随范仲淹，请立按察法，澄清吏治；修改磨勘法、荫补法，精选官吏；改革科举考试，复古兴学，决心以刷新吏治、优选人才为突破口，对朝政进行综合治理。他上朝进谏，退朝草制，同以吕夷简、夏竦为代表的守旧派展开坚决斗争，成了新政派的代言人和辩护士。

庆历四年(1044)四月，欧阳修被派往河东路，考察存废麟州以及民间私铸铁钱、官府自炼熟矾的利弊得失。在河东三个月，他依照新政要求，脚踏实地兴利除弊。同年八月，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，为妥善处理保州兵变善后事宜、加强河北边防作出了贡献。

翌年初，新政主持者范仲淹、杜衍等人相继罢政，欧阳修急切上奏《论杜衍、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，驳斥守旧派诬奏的“朋党”、“专权”论，矛头所指，不仅是构陷忠良的守旧派，也包括惑于流言的宋仁宗。结果招致守旧派的更大诬陷，有人罗织所谓“张甥案”，诬告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关系暧昧。经由朝廷再三查实，诬陷没有得逞，却以别的名目将欧阳修贬知滁州(今安徽滁县)。

这次贬逐，时间近十年。欧阳修先后知滁州、颍州(今安徽阜阳)，知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兼南京留守司事，接

着是回颍州守母丧，一直到至和元年（1054）除丧服，才重返京师。关于这段经历，欧阳修《述怀》诗自述为“十年困风波，九死出槛阱。”

庆历新政迅速失败，给欧阳修以强烈的刺激，他开始体味到世事艰难和改革不易。他一方面为改革受挫深感痛心，一方面以顺处逆，寄情山水，表现出旷达自放的情怀。在滁州的岁月里，他年方四十，自号“醉翁”，实有自我揶揄之意。他的《题滁州醉翁亭》诗，声称要忘却现实：“醉中遗万物，岂复记吾年？”然而，面对守旧派残酷迫害新政派的严酷现实，内心深处怎能平静？庆历五年（1045）七月，好友石介受守旧派头目夏竦迫害，死于家中。政敌们制造谣诬，扬言要掘墓斫棺。欧阳修连续写作《读徂徕集》、《重读徂徕集》诗，为改革志士鸣不平，愤怒声讨守旧派的反攻倒算行径，展示欧阳修的真实内心世界。

皇祐元年（1049）二月，欧阳修移知颍州，开始迷恋西湖风景绝胜，更爱此地水土美好、物产丰饶、民风淳朴，慨然萌发居家颍州、终老西湖的念头。三年后，母亲郑氏逝于南京官所，欧阳修扶母丧回颍州守制。

至和元年（1054）五月，欧阳修丧服期满，奉诏还京，担任吏部流内铨，遭到政敌们的谗害和反对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留在京师修撰《新唐书》，不久，升为翰林学士，兼史馆修撰。

嘉祐五年（1060）七月，《新唐书》修成上奏，欧阳修转

官礼部侍郎。同年十一月拜枢密副使，次年闰八月任参知政事，成为显赫的朝廷执政大员。

这个时期的欧阳修，地位蒸蒸日上，忧国忧民、革弊兴利的政治初衷没有改变，依然坚守进步的政治理想，坚持革新朝政的主张。至和年间的《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》，《论使臣差遣札子》，反对朝廷“曲恩滥赏”，力主限制贵族特权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《乞定两制员数札子》，主张择优选才，解决滥官冗员现象。由于此时宋廷内外矛盾缓和，朝政危机减弱，晚年的仁宗安于苟且。受此形格势禁，欧阳修由前期的激进改革转为谨慎从事、稳健求变。他既不甘心因循守旧、养尊处优，又不能够无所顾忌，奋身报国，内心时常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。

英宗即位后，朝廷爆发“濮议”之争。英宗是已故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，过继仁宗为嗣子。围绕英宗该如何称呼生父，朝臣之间发生激烈争论。韩琦、欧阳修等执政派引经据典，主张英宗称呼赵允让为“皇考”，御史吕诲等台谏派则认为应该称“皇伯”。执政派最终争取到曹太后改变态度，“濮议”以台谏派失败而告终。台谏派指斥欧阳修“首开邪议”，并由此引发“长媳案”。

英宗去世后，神宗上台，御史蒋之奇、中丞彭思永劾奏欧阳修“惟薄不修”，与长媳吴氏有私情。诬枉最终得到澄清，肇事者也因此遭受贬黜。可是身居宰辅，又是一代儒宗的欧阳修，蒙此奇耻大辱，再也无心在朝执政，决意求退，以全晚节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三月，他终于自罢参政，

出知亳州(今安徽亳县)。

在赴亳州途中,欧阳修获准“枉道过颍”,在颍州西湖畔扩建房舍,准备退路。亳州任上,他连上五表四札子,自陈衰残,乞请致仕。神宗不许,且于熙宁元年(1066)八月将欧阳修改知青州(今山东益都)、充任京东东路安抚使。

熙宁二年(1069)二月,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,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,在朝廷掀起论辩风波。欧阳修蛰居青州,没有卷入这场论争。然而,变法的大潮毕竟波及到了他所管辖的京东东路。目睹青苗法实施中的某些弊端,他连上两道奏疏,发表异议。其中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》,批评朝廷不应收取青苗钱利息,不应连续发放青苗钱,更不应强行摊派;《言青苗第二札子》则请求停发秋料青苗钱,还没待朝廷表态,他擅自下令在京东东路停止发放,结果遭到朝廷诘责。

熙宁三年(1070)四月,朝廷任命欧阳修为检校太保、宣徽南院使、判太原府、河东路经略安抚监牧使、兼并代泽潞麟府岚石路兵马都总管。人们竞相传说,神宗准备让欧阳修出任宰相。欧阳修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甚有距离,尽管两者的改革方向基本一致,但实现目标的方法大相径庭。欧阳修不赞成以“理财”作为变法的主题,反对重国计、轻民生的变法方针,反对激烈变法手段。因此,他六上札子,恳辞新命,请知“淮颖间小郡”。神宗见他实在难以勉强,只得让他改知蔡州(今河南汝南)。

赴蔡州途中，欧阳修滞留颍州一个多月，更号“六一居士”，作《六一居士传》，自述晚年生活情趣，向往读书、鉴赏碑铭、弹琴、弈棋、饮酒，以消度余光晚景。在蔡州任上，变法风潮汹涌澎湃，欧阳修健康状况日趋恶化。他再一次进章告老，终于在熙宁四年（1071）六月获得恩准，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的荣衔致仕，归居颍州西湖。遗憾的是，这种泛舟垂钓、啸傲湖光山色的悠闲生活，只过一个春秋，次年闰七月二十三日，欧阳修病逝于颍州西湖畔的私第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
在我国古代历史上，欧阳修是一位著名的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。重创造，是宋朝的时代精神之一，欧阳修则是这一时代精神的首倡风气者。他思想活跃，勇于开拓，具有创造性思维，为北宋中期的文坛、学坛和政坛，奉献了许多新的观点，开启了许多新的门径。在政治上，他是宋代学者型政治家的杰出代表。他宽政爱民，力戒因循，为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，为建树新一代世风和士风，作了不懈努力。在经学研究上，他首创疑经惑传风气，自出议论，使经学研究摆脱名物训诂的束缚，转入讲求义理的方向，对宋代理学形成具有草创和奠基之功。在史学著述上，他主持编纂《新唐书》，独力撰著《新五代史》，不没其实，论辩正统，反对祥瑞，标举名节，丰富并发展我国史书义例。此外，他的《集古录跋尾》、《崇文总目叙释》、《欧阳氏谱图》、《诗话》等著作，对我国古代金石学、目录学、谱牒学、诗话学的形成与发展，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。

毫无疑问，欧阳修对后世贡献最大、影响最烈的，是他的文学创作。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，都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性。他的文学思想，散见于各类文章和随笔之中，概括地说，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：

在文与道的关系上，欧阳修主张“文与道俱”、“道胜文至”。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：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。”（苏轼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引）针对宋初西昆派文人重文轻道的弊端，他大声疾呼提倡“道”，甚至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倾向：“圣人之文，虽不可及，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。”（《答吴充秀才书》）与此同时，欧阳修摆脱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偏颇观点，注意到文学创作的文道区别，肯定“文”的独立价值，认为道不可以取代文，道与文二者缺一不可。他的《代人上枢密求先集序书》，赞同孔子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的话，并且指出：“君子之所学也，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，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见于后世。”强调文学作品既要内容充实，又要讲究文采，达到思想与艺术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。

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，欧阳修主张经世致用，文学要走向社会，接触现实生活，作家要关心百事，针砭时弊。他的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强调君子为学，必须“知古明道，而后履之以身，施之于事，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，以信后世。”在《答吴充秀才书》中，欧阳修反对作家“终日不出于轩序”、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，主张不溺于文。他还提出“文章系乎治乱之说”，倡导“其文博辩而深切，中于时病而不

为空言”。(《与黄校书论文章书》)主张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,服务于现实政治。也正是基于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深刻认识,欧阳修提出了著名的诗文“穷而后工”的理论。

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,欧阳修主张在批判继承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。他重创造,也重继承,既反对一味因袭模仿,也反对刻意标新立异。他的古文创作,继承韩愈的“文从字顺”,扬弃其尚奇好险,提倡平易自然。欧阳修提倡并领导诗文革新运动,是从批判西昆体揭开帷幕的。然而,他以冷静的客观分析态度,扬弃西昆体浮薄空洞、晦涩难懂的文弊,吸收西昆诗人自觉的艺术性追求。他改造骈文,使四六格的骈文走上散文化的道路;在散文创作中,则吸收骈文的句式、章法,讲究文章的立意和情韵,开创宋代散文的新风格。鉴于唐代古文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,欧阳修在创新的旗帜下,既反对浮艳纤弱文风,也反对艰涩怪僻倾向。北宋诗文书革新取得初步胜利以后,一些作家学古务奇,追求简要平拙,流入艰涩怪僻,形成“太学体”新文弊。欧阳修力排流俗,借用嘉祐二年(1057)知贡举的机会,采取毅然措施,予以沉重打击,把文风平易的举子拔在高第,将写作险怪奇涩文章者尽情黜落,保证了北宋古文运动健康发展。

欧阳修不仅为北宋诗文书革新提供了正确而系统的理论,而且创作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他的文学创作成就,以散文为最著。他的散文作品,数量巨大,仅以

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统计，就有两千三百余篇，尚不包括《诗本义》、《新五代史》以及《新唐书》“本纪”、“志”的有关篇目。欧阳修散文内容丰富，体裁多样，前人誉为“文备众体”、“各极其工”。下面按论说、记叙、书简、序跋、赠序、传记、赋颂、奏议、诏册、墓志、祭吊、杂体等十二类项，将其主要思想内容逐一简要介绍：论说类八十九篇，大部分为政论、史论和哲论，还有一部分杂说、字序、策论及策试题。此外，如《上杜中丞论举官书》、《书梅圣俞稿后》、《送曾巩秀才序》及《通进司上书》等文章，详其内容，均为论说，因为本书另有类项，故分别辑入“书简”、“序跋”、“赠序”、“奏议”等类。记叙类的辑录也有类似情况，循依此例。

欧阳修的政论直陈时事，阐述政治见解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战斗精神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针砭时弊，宣扬改革思想。如《原弊》剖析时局，揭露政弊，推究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；《本论》针对朝政积弊，发表“治本之论”；《为君难论》上篇论国君用人之难，下篇论国君听言之难，旨在倡导言事之风。这些文章都可以视为庆历新政的舆论准备。另外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坚持真理，是是非非，同守旧派作坚决斗争。《朋党论》就是诞生在庆历新政的斗争风暴之中，它驳斥守旧派的恶语中伤，破除仁宗疑虑，为大胆进用新政派提供了理论武器。

欧阳修的史论，主要见于《新五代史》等史学著述。本书所辑史论中，有一组值得注意的论辩正统的文章。所

谓“正统”，指封建统一王朝对其一脉相承的系统的确定与认可。欧阳修康定元年（1040）撰写过《正统论》七首，晚年将其改写为《正统论序论》、《正统论上》、《正统论下》三篇。他认为真正的正统，必须是“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”，并创立“绝统说”，以为“正统有时而绝”，不必乖离史实，强求正统。“绝统说”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灵活性，有利于历史著述切合客观实际，影响了南宋朱熹“无统说”的建立，是史学上的重要观点。欧阳修的这组文章，标志了封建正统论的理论成熟，受到历代史学家的重视。

欧阳修的哲论，疑经辨伪，誉议毛、郑，质诸人情，讲求义理，促进北宋经学思想激烈嬗变。景祐年间，他有《诗解》十篇，揭示《诗经》统要。同时开始撰著的《诗本义》，直至晚年才修订定稿，代表作者成熟的诗经观。其中《时世论》、《本末论》以及《幽问》、《鲁问》、《序问》等专论辑入本书。这些论文辨析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得失，质疑《诗序》，引导人们突破汉唐注疏的束缚，排斥异端邪说，从《诗经》本文出发，探求《诗经》本义。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、《易或问》等著述，质疑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等，揭露其并非孔子作品，又大胆地将《易经》内容分成“圣人之言”与“大衍之数”，融其杂乱之说，纯洁经义，开创辨伪尊经新风气。《易童子问》被视为宋儒疑经惑传的滥觞之作，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积极影响。

记叙类三十九篇，大都以“记”名篇。纯粹的山水游

记几乎没有，大都是亭园楼阁记。这些记体文突破前人单纯表现客体的藩篱，对亭园楼阁的废兴始末鲜有记载，即便有一些山水风光描写，也决非文章重点，只是作为媒介物，由此生发议论，引出抒情，强烈表现作者自我形象，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。如《丰乐亭记》记亭写景，都服务于议论。文章要旨在于歌唱太平气象，称颂丰乐世道，表现作者与民同乐的情怀，并告诫人们珍惜和平安乐生活，感怀大宋王朝恩德。《真州东园记》凭藉想象，描绘东园绮丽风光，主题却是称颂真州主持漕运的三位东园主人，宣扬作者的宽政爱民思想。

欧阳修的另一部分记体文，抓住亭园楼阁的命名大做文章，抒写作者的思想情趣，《非非堂记》、《至喜亭记》、《昼锦堂记》、《画舫斋记》无一不是如此。《非非堂记》全文紧扣“非非”堂名发表议论，阐述自己的是非观，表明自己“是是非非”、“宁讪无谄”的做人原则。作者处世为人之大节，在此文当中自表无遗。

还有一种寓言小品式的记体文，记叙作者亲身经历的或是虚构假托的一件小事，说明某种深刻道理。欧阳修的这类文章多为感时伤事而作，篇幅短小，耐人寻味，兼具形象性、现实性和哲理趣味。如《伐树记》以修治东园伐樗留杏写起，感悟事物的幸运与不幸取决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，驳正庄子“以无用处无用”的消极思想，表达自己锐意进取的人生观。《养鱼记》借用大鱼“不得其养”，小鱼“有若自足”的描写，讽刺人才难以进用的现实社会，表达